

文史資料專輯

第六集



主 编：魏仲云

封面设计：陈道学

编 校：邹 祯

沙坪坝区文史资料专辑

第六集

政协沙坪坝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共沙坪坝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璧山县印刷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

印数：1,400册 字数：104,000

工本费：0.80元

目 录

- 一、抗战时期内迁到沙磁区的“流亡大学”……魏仲云（1）
- 二、我在四川省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十年经历……李光岱（3）
- 三、我在省女职校的两年……傅世珣（14）
- 四、杨若愚与树人学校……魏仲云（17）
- 五、私立蜀中艺术专科学校纪略……王运启（23）
- 六、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沙坪坝……张建中（29）
- 七、宋美龄、胡宗南为董事长的中正中学……魏仲云（32）
- 八、一所富有革命校风的学校——民建中学……史 扬（36）
- 九、蜀都中学创办的经过……周学庸（43）
- 十、以邹容烈士命名的邹容中学……童伯乔（49）
- 十一、私立萃文中学见闻……江乃东（53）
- 十二、虎头岩上的红色据点——大有学校
……尹 凌（56）
- 十三、莲光小学史略……李敬崑（61）
- 十四、一九四六年在沙磁区发起成立的“重庆私立中学教师联谊会”……肖杏邨（71）
- 十五、党在沙坪坝的文化阵地——沙坪书店……魏仲云（80）
- 十六、国立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纪实……郑体思（84）
- 十七、马寅初先生在歌乐山……魏仲云（91）

十八、重庆谈判期间在土湾发生的“李少石事件”

.....魏仲云 (93)

十九、沙磁区地下党争取原西藏“班禅驻京办事

处”留渝起义的经过.....伍启明 (97)

二十、率领原班禅驻京办事处留渝迎接重庆解放的

经过.....孙格巴顿 (103)

二十一、潘仰山和豫丰纱厂.....沈同明 (109)

二十二、重庆特殊钢厂创建人杨吉辉.....李敬昆 (118)

二十三、有小重庆之称的磁器口.....郑邦有 (124)

抗战时期内迁到沙磁区的“流亡大学”

魏 仲 云

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大专学校为了培育抗日建国人材，在抗日烽火中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纷纷向大后方迁移，先后迁来四川的高等学校有48所，占战前国统区108所高等学校总数的44%。迁入重庆的计25所，其中迁入沙磁区的12所，占迁渝大专总数的48%，而且多是战前有声望的学校。当时，沙坪坝上学府林立，名流学者荟萃，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区。抗战八年沙磁区的各大专院校为民族解放抗战事业培育了大批人材，也为我们沙坪坝文化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当年内迁到沙坪坝地区的高等学校有：

国立中央大学。原址南京，校长蒋介石（兼），后为罗家伦。1937年10月迁来沙坪坝，先在重庆大学内建临时校舍，后在松林坡建校，设文理法教7个学院，迁川学生2025人，并在柏溪建有分校，1945年10月复员迁回南京（现南京工学院的前身）。

国立交通大学，原址上海，校长吴保丰。1940年秋迁小龙坎设分校，1941年转迁九龙坎。

国立上海医学院，原址上海，校长朱恒璧。先迁昆明，1940年夏迁至歌乐山，在国民政府卫生署中央医院附近建校，集中全国医学界著名学者教授。1946年8月复员迁回上海。

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原址南京，校长魏元光。

1938年2月入川，6月在汉渝路（现重庆药剂校）建校舍。
1946年奉令留渝，直至重庆解放后并入建工学院。

国立音乐学院，原址上海，校长戴粹伦。1939年11月迁来浮图关，1943年更名国立音乐学院分院。1946年10月迁回上海，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专。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原址天津，所长张伯苓。1939年夏迁沙坪坝津南村，1948年迁回天津。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原址北平，校长吕凤子。1940年秋从昆明迁璧山，当年11月迁来沙磁区盘溪，1946年夏迁回北平。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原址杭州，校长吕凤子。1940年先迁璧山后迁来盘溪，1946年8月迁北平与北平国立艺专合并。

国立山东大学，原址青岛，1937年底迁来沙坪坝并入中央大学。

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原址南京，校长姚枋。1942年在云南大理，1945年7月迁来沙磁区新开寺。1946年10月迁回南京。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科学校，原址北平，校长何元。1938年夏迁来沙坪坝，借重庆大学校舍上课，1946年迁回北平。

国立扶轮学校，原址南京，校长陈桂森。1939年先在新开寺，后迁化龙桥。

国民党军政部陆军大学，原址南京，教育长杭洪志。抗战初期迁山洞建校。后迁南京。

我在四川省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十年经历

李 光 岱

一、略述省女职校成立经过和我的愿望

四川省重庆女子职业学校（简称省女职校），是军阀刘湘为约束他部下的姨太太们办起来的。这些姨太太们一般都以吃喝玩乐来消遣，就不免发生一些事故，甚至影响她们丈夫彼此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刘湘感到这些姨太太们不务正业，惹事生非，不是办法，才同幕僚商量创办一个职业学校，把这些姨太太们纳入学习职业的范围，以约束她们，这便是刘湘要办省女职校的原因。

我是一九三〇年秋季到省女职校的。我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熏陶下，並先后担任过铜梁县中教务主任、合川女中校长之后来接办省女职校的。当时的社会潮流已远远超越辛亥革命时期的范畴，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爱国学生已经觉醒起来，反对旧文化、反对专制、反对封建、反对包办婚姻，接受民主自由和新文化，这股新思潮力量十分强大，而妇女要求摆脱封建压迫，尤其强烈。

我的挚友、同学饶国模（红岩村女主人）、岳永著（中共秘密党员）和我三人商量，利用省女职校这个地盘，为妇女争取解放，特别为处于贫困中的妇女提供读书求学的机会（省女职校设有“贷费”），以培训妇女就业的技术能力，使她们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于是我们就本着这种设想制定办学方针。

十年来在众多的教师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也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如我们新中国第一任女大使丁雪松就是商三班毕业的学生；又如王光弟、李智仁、彭玉洁、曾纹祺、闵蓀佳、鲜国学等，她们家庭贫困，或者是逃婚与家庭断绝了联系，思想进步，学习努力，有的在校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毕业后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入党，对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

二、饶国模、岳永著与省女职校

饶国模是大足人，比我大四岁，是我铜梁女子学校同学，她二哥饶国梁是黄花岗烈士之一，她受二哥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深。后到成都读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又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后她与铜梁刘国华结婚，我们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国模对党的南方局的贡献深受老一辈革命家敬重。1948年秘密参加共产党。

刘湘要办省女职校的时候，刘国华正任刘湘军部的政务处建设组组长。知道了这一消息后向国模说了这件事，并说省女职校内部要办农、工、商三科，妇女学农的很少，问她能否介绍一位学农的担任农科主任。国模很高兴说：“岳永著、李光岱都是我的好朋友，岳是北京农大毕业。她任农科主任是最恰当不过的”，就推荐岳永著进了省女职校担任农科主任。

她在我任省女职校校长的十年中，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是刘湘军部有关我校的消息及时告诉我和永著，以谋对策，也将社会上的舆论收集转告我们，使我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这不仅帮助了我，也给省女职校师生无限的支持，我永远铭记她的真诚友谊和高尚品格。

岳永著，四川南江县人，南江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永著出

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幼小时同兄弟姐妹在家里的书房读书，到十一、二岁后就不准她再读。她只好在原有基础上拚命自学，读了不少古籍诗书，到十五、六岁时，家里就把她许配给一个地主家作媳妇。她非常着急，但无办法，就暗中向人借了几十元钱，偷跑到成都省一女师考插班生。由于她打扮十分土俗，受到同学的嘲笑，我了解她的情况后，对她十分同情，敬佩她的勇敢明智精神，设法使她编入我同班。我俩从1917年到1940年离开省女职校止一直在一起。她学生时代所需一切费用，都由我无条件地帮助。我们虽非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一九二五年，我和永著都在北京农大学习，她就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虽未明说，但我从旁很清楚地知道她是共产党员。我办铜梁中学与合川女中都得到党的支持。是按照永著所提出的办法进行，的确都做出了成绩。到省女职校后，永著成了我的依靠力量。我们商定，学校内部的事由永著负责，外面的事由我负责，但事前须彼此商量，事后须互告结果。

三、我作了省女职校的校长

一九三〇年七月，国模和永著写信告诉我，省女职校发生学潮。发生学潮的原因，一方面是校长苗维汉干涉学生自由恋爱，并开除了一个学生，激起了学生的公愤；另一方面，因排课与岳永著有了矛盾，苗就拍桌大骂排课的教师“大逆不道，以下犯上”，引起了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于是教师与学生合流共同驱逐苗维汉。但苗是深得军阀蓝文彬（刘湘师长）的支持，形成一股封建反动力量，以岳永著等教师和学生组成一股驱逐苗的进步力量，两派相持不下，但学校是在二十一军军部政务处管辖之下的，人事纠纷全由政务处解决。在此情况下她二人把我介绍给政务处长李公度，李是想找一个正派而干练的女

子来办这个学校，以减少他的麻烦，来信说李想见见我再作决定，希望我赶快来渝商量一切。我接信后，先是感到合江女中对我好，舍不得离开，继而我又想重庆是大有发展的地方，省女职校的工作更有意义，机会难得，朋友又这样关心，于是我决定接受聘请。

到重庆第二天，永著、国模已商定由政务处教育科长马啸尘陪同我去见李公度。李对我说：你在铜梁和合川办学很有成绩，重庆省女职校这个烂摊子希望你能来此把它整顿一下，解除我的麻烦，你的才干我早已了解，必能胜任愉快。我见他态度诚恳，说话坦率，我就说：“办一切事都要有职有权，否则是办不好的，校内用人行政之权如能完全由我主持，我就负责把它办好。”

李公度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他确能遵守诺言，也从未干涉过学校的内政，故而我能在学校里做出一些成绩。我所以要向李公度提出校长的用人行政之权不受干涉，因为掌握用人权，就能用我思想上最崇敬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质量和培育出一些有进步思想、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在北师大，认识不少的朋友，其中有的是地下党员，后来我主办铜梁中学和合川女中，又增加了不少社会经验，使我深深感到妇女要与男子平等，必须要有知识和工作能力，妇女本身有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得到解放自己，而后才说得上男女平等。我是怀着这条信念来办省女职校的，但要实现这条信念，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这种重任，所以在我任期内，国模、永著介绍了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教师来校任教，给了我很大支持。

办省女职校的几项原则：

（甲）要进步力量形成核心

一、学校的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庶务主任都必须尽可能

的找进步教师和党员充任，形成学校的核心。本此原则，省女职校在我任职十年内，教务主任先后有何绍先、朱敬之、刘季昆、蒲剑秋、傅世珩、郝文彪（罗清）等。训育主任岳永著、庶务主任王季愚、黄梦谷、戴伯镛、杨冀侃、戴琴宣等，进步教师有朱敬之、雷雨田、陈一荪、侯野君、赵铭彝、张宇桃、高雨棠、赵湘如、范仲芬、荣高棠、游时敏等，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历史上与党有过组织关系的。

二、各个主任都必须兼课，要与学生接近，才能了解学生思想情况。

三、教师方面，必须多用进步人士，在数量上进步教师应占绝对优势。

（乙）重新建立新的规章制度

一、学校原有贷费。能吃贷费学生分三类，一是成绩好，家庭又确实贫苦，其家又在外县的，吃三餐；次者吃两餐；再次者吃一餐，全由校务会议决定。

二、学校分农工商三科，三年毕业。经过一段时间农科取消了，改办家事科，商科也取消了，改办初级会计和增设高会两科。

三、学生方面，绝大部份都是生活朴素，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她们有比较好的素质，其中一部份是由于她们环境恶劣、物质生活条件差，我们针对她们的实际情况，在党的教育精神指导下加以培育。因此，凡是在省女职校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对她们专业都学得比较扎实，工作能力较强，也符合她们经济独立的实际要求。

以上各项办法，凡涉及党的问题，我们都秘而不宣。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是不能宣布的，今天不能不写出来了，因为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党。

根据上面所提的办法，都认真做了。所以仅仅两年多光景，就确实做出了成绩，学校读书风气大有改善，民主进步气氛有所增长，在社会方面，也有较好的声誉。先后有一些考入重庆市各银行工作的，又如重庆市各中级学校童子军检阅，省女职校名列第一，这与培养知识妇女经济独立、妇女解放的精神是符合的，因而鼓舞和促进了在校学生更加勤奋和团结。

有了上述事实，我就去向政务处长李公度汇报学校情况，我还未开口，他就高高地伸出一个大指姆对我说：“光岱，您很露脸、很争气，您学校的成绩，已有人向我说过，我都晓得。”我谦虚几句，又汇报了学校一些情况才走。

四、校内外的激烈斗争

重庆是军阀刘湘的地盘，在重庆的机关、单位、学校都是刘湘部下派系争权夺利的目标，凡已经得到权位的人，都与刘湘亲信有密切关系。我是外来人，由于李公度的信任而委任我的，说不上与刘湘的人有什么关系。当李公度去职以后，我就显得非常孤立，省女职校也就成了一些人争夺的目标。由于校内部很团结，进步人士较多，学校声誉好，对我个人也无懈可击，要无缘无故撤换我，在表面上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们必须在校内制造混乱局面，再把混乱事实制造舆论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编造罗织罪名强加于我。他们的手法是先在校内以优厚条件收买了个别学生在学校捣乱，只要捣乱的事透露出来，他们就里应外合全面动员向我进攻，以达到逼走夺取的目的。那晓得他们的如意算盘以失败告终，现在且把几个事实写在下面：

他们阴谋破坏的事故有四次，两次放火、一次放毒、一次将死婴放在校内。当永著听到有纵火情况时，就飞步跑往现场，先把几处通道门关了，不让学生进来。接着就集中工人迅

速扑灭还未成灾的火苗，将一切就绪之后，才开通大门。除当时在现场的人以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两次放火行动大致相同。

有一天午餐前二十分钟，突然一个学生跑来对永著说，食堂桌上菜盘内有白粉粉，她听后，立即飞步跑去先将时钟倒拨了三十分钟，又跑向食堂将盘内白粉除去，并将盘子消毒，一切安排好后，才打钟吃饭。在省女职校放毒的事，捣乱分子又算失败了。与我校事件情况相同，重庆二女师有几十个学生中毒，两相比较，我们警惕性高，永著机灵敏捷，才消除祸患。

在某天早晨黎明时，打扫操场的工人来说，操场坝摆了一个死婴，永著听了这个消息，叫工人马上把死婴拿来摆在我的床下，深夜，永著叫工人在校园挖了一个深坑，将死婴放在坑里，浇下两瓶强水再盖上土，这就消患于无形。

这三件事都是永著的机敏果敢，才迅速的粉碎了捣乱分子的阴谋。

永著显露的工作能力以及她的为人，一些人便怀疑她是地下党员，曾向刘湘军部去控告陷害，想把她赶走，甚至要抓她，可是敌人的阴谋也未得逞。

一九三三年秋末的一天，北京师大地质学教授翁文灏来四川作学术考察路过重庆，他是我师大的老师，我邀他来给学生讲话，时间是那天午后三时，讲演开始不久，传达说，有4个人很凶的样子要会我，那4个人见了我把“派司”向桌上一丢，气势凶凶的说，我们是有任务来的，你学校的岳永著在吗？军法处请她说话，现在就同我们一路走。这时永著正在礼堂听翁文灏的演讲，我从容地对他们说，岳永著今天到江北五小去了，因为她是五小校长，我明天负责把她送到军部来，一

切责任都由我负。他们还是不走，我又说，如果她明天不来，你们就来逮捕我好了，我是走不掉的，他们这才悻悻然的走了。等翁文灏走后我们一面找三位老师陪同永著去南山暂避；一面找马嘶尘去向李公度报告，要求李去向刘湘作疏通，才算掩护过去。

五、在抗日战争时期学生在学校领导下的各种活动：

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一带把汉奸殷汝耕等抬出来组织反动政府搞分裂中国的活动，这就爆发了一二·九事件。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了，重庆学联分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学校选出了曾纹祺、闵庶佳两人去参加，并被选为学联理事。接着，党在重庆秘密组织了救国会，由漆鲁鱼同志领导，参加的学生有丁雪松、李智仁、罗炽庸、周德光、曾纹祺、闵庶佳、单光淑、鲜国学、彭玉洁等。学联在校组织的读书会成为学生一切活动的核心组织，在校内办了四期墙报，散发了标语传单，每周星期六或星期天都组织上街宣传，还演过一些戏剧。如《索满姑》、《放下你的鞭子》、《战友》等。唱“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毕业歌”、“梅娘曲”等救亡歌曲。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还组织了一些学生参加追悼会。省女职救亡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有人把省女职校称为红色摇篮。

学校重视教育质量，除积极支持学生的救亡活动外。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是非常关心的，教师中在国内外著名大学毕业的占绝大多数。所用教材，高中班多半采用大学预科的教材，初中班大多采用高中班的教材。在实习方面，商科办起了小银行、小商店，工科生产的袜子、雪花膏、童装等成品，则由商店销售；农科办有农场，场内有养鸡、养蜂、养蚕及园艺等专

业学习。由于学校采用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学生都学得好，单是商二班考取四川省地方银行的就有多人，对其他各班震动很大，这些都是学校提高学生文化和业务水平的效果。但以后学生就业，仍有不少困难，女子就业本不容易，因而在救国会“职教”的影响下，校内成立了“职业互助会”，利用各种关系尽可能的协助解决就业问题。

一九三七年学校办起了高级会计班，校址迁到沙坪坝。在教务主任郝文彪（罗清）、教师荣高棠同志的领导和重大、中大的影响下，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正是抗战开始，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救亡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学校曾先后请过邓颖超大姐和史良大姐、马寅初先生来学校讲演，学生对他们都非常崇敬和信仰，尤其对邓大姐所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爱国情绪就更加高涨，学生自治会由中共地下党员曾洁领队，组织了外出去璧山乡下宣传抗日。

一九三八年夏，成渝两地的爱国青年共同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加强抗日力量，这个团是由我校学生鲜国学、彭玉洁（党员）领导，当他们由成都经过重庆时，省女职校在沙坪坝校内开了个盛大的欢送会，他们两人带领队伍于当天晚上离开重庆，奔赴前线。解放后我们才知道鲜国学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真不愧是党的好儿女，也是省女职校值得自豪的。

六、我离开省女职校

七七抗战爆发后，我也参加了“重庆市妇女抗敌后援分会”等救亡组织的领导工作，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到一九三八年后期，蒋介石暗中与日伪勾结，准备对日妥协，到了一九三九年妥协投降的面貌日益暴露，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动政策，对省女职校不断施加压力。

一九三五年刘湘作了四川省主席后，省女职校的隶属关系就由二十一军政治处转移到四川省教育厅，从此各方面的关系就发生变化，情况大不如前，不但经常给我打麻烦，在经费上竟不按时拨款，甚至一拖数月不给钱，使我万分为难，搞得我身心交困。

一九三九年冬，我因身体虚弱，很少出房门，凡有事与我商量的都到我寝室来。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极其讨厌、使我感情上不能忍受的事，我突然接到一封恶毒攻击岳永著的匿名信，这样的事在以往最多一个星期永著就把底子摸清楚了，这次摸了两个星期之后，还毫无踪迹，我和永著很着急。一天晚上突然有个叫刘剑平的学生到我寝室来，她是广东人这学期才招的新生，她直截了当的向我说：“骂岳先生的匿名信校长查清了没有？我知道底细，可以告诉校长”，这学生态度严肃、语调强硬，我有点生气又有点诧异，但我马上就镇静下来，很和缓的说：“好的，你讲吧”，她接着说：“我不是来读书的，因你有亲共嫌疑，我是来监视你的，我每月的津贴是大洋六十元，我未婚夫在中央大学每月津贴大洋二百元，他是专门监视学生行动的，这就是我的来历和任务”，她接着又说：“这封匿名信是陈淑君起稿我改的，李崇贞的未婚夫在红庙茶馆写的（沙坪坝以前叫红庙）。所以你们清不出笔迹也摸不到底细”，说完她就走了，使我惊奇的是陈淑君、李崇贞是两个比较进步的学生，怎会写匿名信来攻击永著呢？一会李、陈两个学生就进来了，她们跪在地上并扑在我身上痛哭流涕的说：“校长我们错了，受骗了，希望校长原谅我们无知”，我听完她们恳切的话语和看到她们沉痛的态度，我心情很复杂、思想也矛盾，当时曾这样想，她们的行动究竟是真的或是假的？如果是真的，经过数年的培养，短时间为什么就会与特务学生合流，

如果是假的，何以又会哭得那样伤心，我们已经在特务学生监视之下，毫无所知，如永著再不离开学校，可能有更大的危险，为了永著的安全，保存党的实力，我想让永著走。但永著一走，我就失去靠山，失去党的领导。哪能办好学校呢？把这些想法和永著交换意见后，她决定走，我也决定辞职。

过了两天，教师涂光斗来找我，开口就说：“校长你何必辞职，老实说我是“C·C”的，郭有守厅长也是“C·C”的，只要你把郝文彪取消，我来作教务主任，我给郭有守厅长去一封信，慰留的指令就会很快下来，你一样作校长，你又何必辞职”。这个特务露骨的话明明是要逼我排挤进步势力，向反动势力投降。我的性格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想到这里，我反而平静了，微微笑了一下说，涂先生的好意我很感谢，我已决定离开省女职校。不久辞呈批准了，我同永著就离开了省女职校。

我当时的心情是：一、省女职校绝大多数学生是进步的、认真读书的；二、全校师生在党的指引下能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三、社会舆论对省女职校是有好评的。

以上我在省女职校十年的概述，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经历，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看到、听到昔日的部分同事仍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发挥领导作用，一部分虽已离休、退休，仍从事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余热。我的许多学生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为党为人民献身，给我古稀之年的多病之躯无限欢欣与安慰。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祖国，才有这份幸福！可惜国模、永著我的好战友、好同学、好姐姐都在六十年代去世，我将永远怀念她们。